

社会经济在中国(下)

■ 钟秀梅 古学斌 张和清 宋少鹏 卢晖临 刘 亚 李昌平 严海蓉 何 明 夏循祥 等

钟秀梅(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台湾合作经济的经验分享



大家好!我演讲的主题是“台湾的合作经济”。首先要对合作经济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合作经济是在人民有主体性的条件下创造的经济连结关系,透过这样的连结关系决定自己的生

计和生活的方式。

下面举两个案例,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特别是第一个案例——高雄的美浓,我家乡的运动。我们从1994年发动反大坝运动,直到现在。第二个案例是我蹲点研究的地方——台中的日月潭。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死亡2400人,震倒房舍超过10万幢,我记录了日月潭邵族部落居民灾后重建自我组织、自力造屋的经验。

我出生于60年代中期,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台湾接受美援的年代,经济发展模式是牺牲农业支持工业,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再以低粮价政策支持偏低的劳工薪资,这也就是台湾原始积累的过程。

这个过程对我们农村出身的人而言,其实是很残酷的。在过去,我们农村里有很多“common”

的东西,也就是说,所谓“公共财”或“团结经济”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在我们原初的社会形态里就有。比方说我们客家人有“交工”的社会形态,也就是家户互助,农忙时可以换工,可以协力劳动。像日月潭邵族这样的原住民部落,其生活、劳动,当然也是以协调劳动为基础,讲究的是互助互信,不必以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回到农村,回归部落,他们就想要恢复、重建其心目中的团结经济跟“common”的概念。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从当年的国际局势回顾台湾的发展史:其发展脉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与世界体系的观点切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至纽约,政治的指挥权移向华盛顿,开启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成长年代。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示“发展的年代”(the era of development),号称要“运用大胆的新计划,推动美国科学的领先,促进工业的进步,改善未开发地区的成长。老牌帝国主义以剥削他人夺取自身利益,此非本计划所设想的,我们的发展计划是以民主的公平往来概念出发的”。①杜鲁门所宣示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既是发展计划,也是意识形态输出,意图以国家之力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阻挡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加拿大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其名著《震撼主义》中提到,“发展主义”原为被殖

民国家主权独立后,为要“追赶”西方世界与苏联,以国家主义之力快速实施工业化,其中部分国家采取国有化的发展主义目标。娜奥米·克莱恩强调由于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与跨国企业唯恐佃农分配土地,拒绝工人加薪,更不愿矿场、银行等收归国有,在美国与英国的外交圈兴起一个运动,“试图把发展主义政府编入冷战的二分逻辑中”。^②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政策接近国有化和凯恩斯主义,其政权即依照二分逻辑,被栽赃为“共产主义”。1965年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政权与1971年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被推翻,即是此思维下的产物。然则,埃及政治经济学家阿敏(Samir Amin)认为右倾化、科技治国论的发展主义思想,其特点是对于外援与外资的强烈需求。

发展主义的模式成为经济挂帅模式,在强势的西方科学知识与技术理性所建立的法则下,变成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发展模式。发展中民族国家接受这些模式,同时接受资金援助与政策移植,使得南方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朝向追求成长、发展和现代化的目标发展。但是,这种强调社会阶级秩序、发展主义与国族主义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就是三位一体的父权资本经济霸权。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说法是: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规则引领着世界的生产,而世界的生产首要考虑的是那些拥有或控制生产手段的人,它是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哥伦比亚学者伊斯可巴(Arturo Escobar)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主义的三个主要策略:一是技术专家介入各项发展计划;二是沿用西方的经济理性逻辑,发展的专业进入了知识、规训和生涯规划领域;三是由中央计划的政策奏效,创造了紧密的连接系统,让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等不同层级的发展机构由上而下的控制达到乡村地区。

回到我刚刚所说的,我们60年代出生的这些

人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呢?可能都是非常不好的记忆。比方说,“绿色革命”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我父亲就是一个农民,当时用了大量的农药,中毒死亡,其实这种事情在农村是很多的。传统生计、生活体系的解体,出口导向政策的工业发展,大坝建设供应快速增加的城市人口跟工业用水,高速公路带动汽车消费等等,这些都是一路下来的发展主义思维。

我下面引用台湾学者郑为元的说法。他认为东亚强大的发展型国家,几乎是20世纪70~90年代东亚“经济奇迹”的关键。他还认为威权、法治和官员教育能力是国家自主的来源,而“技术理性”官僚拥有较大决策权力。以台湾为例,财经官僚(如李国鼎)的实质权力大于技术官僚,虽然宏观的经济计划还是依靠许多美国经济顾问与委托美国公司规划,其决策权相对自主。但是,郑为元也反驳了东亚发展型国家“官员比较能干”、“技术官僚是好的经营者”、“政府廉洁”等说法。他指出发展型国家基本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体认其一,国家需要发展;其二,发展需要一套政策而非让社会各部门自由发展,各行其是;其三,这种发展需要国家机构制订、介入和协调。

在这样的前提下,到底台湾社会如何进行反思呢?1984年,《中国时报》刊登了渔父与陈映真关于“依赖理论”的辩论,陈映真在《“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评渔父的发展理论》一文中,认为渔父和发展论者、现代化论者与资本主义维护者简单化“依赖理论”,只理解成既有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课予落后各国的锁链。陈映真认为渔父们“把依赖看成是一种自存、既存的情境”,而非理解成一种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情境。渔父认为如果贫穷地区纳入体系,如果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一定成长更快。陈映真认为尽管渔父和发展论者、现代化论者与资本主义维护者批评论点有差异,但

共同的是他们都不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今日世界“先进”与“落后”的结构关系,反而一味强调经理人、经营的重要性。陈映真强调:“第三世界国家不论贫富,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自主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订制和选择繁杂的发展政策时,能够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因素的拘束。然而不同在于,贫困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更多是按照支配性的外国经济而不是本国经济的需求所促成的。”陈映真特别强调从历史脉络来理解“第三世界人民再穷、再饥,也还有人的尊严”。问题是,发展是谁在作主的发展?是为谁的发展?

渔父与陈映真精彩的辩论待三年后台湾解严,才有一系列相关书籍的出版。台湾出版界在1987年之后出版了关于发展研究的译著,如《发展理论》、《发展社会学》、《不平等的发展:论边陲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构》、《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等,^③除了间接响应解严后蓬勃的社会运动外,如由鹿港反杜邦运动所带动的环境运动(包括反核、反公害与生态保育运动),也开启了台湾社会对经济成长论与GDP马首是瞻的反思。^④如雨后春笋般的环境运动与社会性刊物的出版,如《夏潮杂志》、《大地杂志》、《春风杂志》、《台湾环境》、《人间杂志》等,是直接由内部人民响应发展主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通过80年代台湾社会内部的运动与关于发展理论的译介,如何看待台湾发展主义性质?从历史脉络看来,50年代由美援支持的大型建设和农业的发展,确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而60年代资本积累过程的经验,产生了两种矛盾的性质:一是依赖于美国支持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二是“国家性质”的威权化,在非西方架构的法律秩序与民主形式之外发展,其结果是发展了以低工资、高污染、低附加价值为基础的外销导向产业政策。此发展依附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生产体

系,如同东亚经济学者布鲁斯·康敏斯(Bruce Cumings)所争议的“官僚威权工业政体”(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industrializing regime)。

紧接着就是刚刚我介绍的邵族经验跟美浓经验。80年代,台湾原住民部落就有“还我土地”运动,要求国家把原住民祖先生活领域的土地还给他们——他们面对全世界原住民一样的问题——财团的入侵。大量的开发造成原住民生计跟环境的破坏,观光也带来严重的破坏。

邵族就是原住民问题的一个缩影。它是日月潭旁边的一个小部落,有63户,目前人口差不多才400人。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部落,他们重新凝聚起来就是“921”灾后重建的关键。邵族原初生活的领域,除了水域之外,还包含森林。因为水库的发展以及土地重划,他们的土地大量流失。在土地被剥夺的同时,他们的记忆也被迫改变。可是“921”大地震之后,由于同心协力,族民组织来自力造屋,昔日族群的共同记忆又回来了。其中,协助邵族重建的灵魂人物就是建筑师谢英俊。

再谈到美浓反大坝的运动。从1994年到2000年是反抗的阶段,镇民团结反对建水库。2000年到2005年,开始进行有机农业的推广和团结经济,那是一个城乡合作的运动,包括设农民社区大学。最近,我们则是争取把原先划定要建水库的地方变成国家自然公园,也就是说,我们要拿回“the common”的权力。

我们的运动要保护的面积将近4400公顷。大家从图片上就可以想见其景色之美丽以及水资源保育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连接水域的重要网络,也是黄蝶孕育的宝地。看看,黄蝶群起飞舞,是多么美丽!有多达5000万只蝴蝶就在这个山谷里飞舞。整个黄蝶翠谷,就生物多样性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包括已经非常稀少的八色鸟。八色鸟有一个跟郑成功相关的美丽传说。

还有数不尽的树种。我们的运动,除了生态教育和捍卫居民生存权利之外,还同时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譬如,林生祥就是从运动中培养出来的一个歌手。

通过台湾的发展经验以及我所举的两个案例,我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固然重要,可是,必须要搞清楚,到底是谁的经济,谁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创造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创造一种可以带来快乐与幸福的生活模式,由此带来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我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思考的。

谢谢!

古学斌、张和清:七仙娘的故事——乡村旅馆与另类社会经济的实践

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许多社会经济的实践,我们今天介绍的只是刚起步两年多的在广东农村一个有关社会经济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每次介绍我们的项目,都得从十年前我们团队

在云南平寨的项目讲起。

2001年,我们团队进入云南一个边远的山村建立农村社会工作实习基地,目的是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不管是在中国的其他农村,还是云南的农村,十年走过来,我觉得我们在云南农村所观察到的状况,其实跟中国其他农村的状况有根本性的类似。云南边远少数民族农村正面临逐渐衰败的境况。它的衰败其实跟学者批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时所提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那就是“绿色革命”或者说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的破坏。在农业现代化的整个

过程中,我们常有一个迷思,以为现代科技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发展,或者说为农民带来生活改善,而云南的农村告诉我们,其实并没有。虽然改革开放早期我们看到农村有一些发展,不过到后面的20年农村却有返贫的迹象,农民生计越来越艰难。而且,我们也看到现代农业科技除了对传统农耕文化造成破坏之外,还带来非常严重的环境破坏。就简单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明白,那就是杂交稻的引入、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除了导致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外,很多土地和水源也被污染了。长远来讲,这牵扯到我们的粮食安全和生存的问题。农业生产不单是农村的问题,也是城市的问题。我们一直强调不应该把农村跟城市的问题二分,农村的问题同时也是城市的问题,农村无法生存,城市也无法存在。然而很多人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不顾农村的死活,不断对农村进行剥夺。

现在每年政府都说农民增产,我也承认是有增产,但增产不增收。我们每天在传媒的报道里面都会看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苦况。今年初山东白菜农自杀就是明显的例子,今年底内蒙古的土豆农也有同样遭遇。土豆是增产了,但卖不出去,价格低得离谱,生产出来的土豆只能堆在田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农村越来越严重。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的生计越来越不确定,作为改革先行的广东农村也没有两样。我1996年在广东梅县做人类学调查研究,当时梅县已经被打造成全国的沙田柚基地,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沙田柚。大规模种植也带来了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后来水果的质量越来越差,价格也越低,十几年后其实农民也没有因此获得多高的经济收入。2009年,我们团队有机会进入广州从化的仙娘溪村。从化山区的状况跟梅县一样,也是大规模的农业商品化,政府鼓励村民大量种植砂糖橘。农业商品化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生产的单

一性,这严重影响了生物多样性。另外,农民必须直面市场,但市场像一头野兽,是农民无法控制的,单一种植使得农民的生计有很大的脆弱性。从化的砂糖橘没有逃过市场经济的厄运,我们当时进入从化的时候,就不断听到村民述说苦况,近几年砂糖橘的价格也是掉得乱七八糟。

所以当我们在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时候,必须思考整个市场经济的问题:到底谁在掌控这个市场?掌控这个经济?今天早上也有争论到底外来的理论概念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对我来讲,中国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别把中国本质化。中国文化一直都处在演变的过程中,它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模样。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与全球资本接轨,当我们思考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其实中国农村也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里面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觉得西方对全球资本主义批评的理论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社会经济是最近我们备受启发的理论,它对我们的行动是有指导意义的。

下面我要梳理社会经济的一些重要讨论。社会经济源于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国家主导市场经济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像波兰尼所批评的那样,市场经济把人、自然(土地)和货币通通变成商品。利润极大化变成了发展的真理,一切经济运作都是为了经济利益极大化,资本的剥夺由此变得“合理”,为了经济的发展,其他一切方面,包括环境、人的尊严等都可以牺牲。为了资本的不断累积,消费主义也成为真理,人类的欲望不断被推高。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带来的后果是生态灾难,人类未来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今的经济是资本垄断与国家宰制的经济,是一种非民主的经济,造成经济的极度不平等,因为它是服务大资本和官僚的,所以我们要倡导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一种真正民主的经济。

社会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当今一种另类的解放道路,它重新把经济放回到适当的位置——经济其实是要服务人类,而不是人类服务经济。社会经济强调公平正义、民主与集体主义。人和社会在社会经济中被放回到经济的核心,成为发展的主体。而资本主义和国家宰制的市场经济造成了两个“不和”,那就是人与人不和、人与天地不和,所以在社会经济中,我们要重新恢复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要强调共生、合作和互惠的关系。另外,社会经济强调经济中的公平正义,强调社区民众的福祉永远高于利润跟金钱的累积,反对压迫和剥夺。社会经济中丰富多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由社区民众共同开创的。这是一种民主的经济,民众通过合作,共同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在社会经济中,我们还要恢复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非永续性的,人类不断向自然剥夺,其实是在不断消耗我们子孙的财产。所以沿着社会经济的思路,我们还需要改造现在的消费模式。我们在云南和四川灾区已经开启了城乡合作的社会经济实践,通过搭建城乡互动平台,填补城乡断裂的关系,促成一种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生产—消费”关系。我们努力把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希望促成“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及“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我们还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培育城乡合作组织,发掘农村社区的能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优越的生态资源,推动城乡合作,和谐城乡关系,化解“三农”问题。

我们今天主要讲广州从化的案例,也是希望仙娘溪村尝试一种另类的社会经济实践,希望最后能够达到三种赋权:生产者跟消费者的政治赋权、经济赋权和文化赋权。这三种赋权其实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接着我们就来谈七仙娘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从化的仙娘溪村。张和清老师将介绍我

们如何寻找到仙娘溪村,如何扎根在村里推动乡村旅馆的社会经济活动,妇女和村民如何通过这个项目得到赋权,我们又如何推动城乡合作的运动,从而改变城乡的关系。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最近广州电视台去我们从化项目点所在长流村拍了一个短片,讲述“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等社区经济的做法。分上下两集,上集讲述我们绿耕团队如何在村里将底层妇女(“七仙娘”)组织起来,发育互助组,支持村民种养殖,并将老屋修旧如旧改造成为乡村旅社交由妇女互助组经营等组织村民的故事;下集讲述我们如何利用广州公平贸易店和城市社区农墟的消费者网络平台,通过城乡合作,帮助农户直销生态农副产品。

我对刚刚古学斌老师讲的内容做点补充吧。我们深入云南、四川、广东农村从事社会工作已经11年了,我们认为农村贫困包括生产致贫、消费致贫和生态致贫。尤其是生态致贫非常典型,比如四川是天灾人祸的恶性循环,这种灾难的恶性循环不仅使许多小康村一夜之间变成生态难民村,而且使人们在灾难社会中越来越感到恐惧。高铁也是一个例子。很明显,农村的贫困是不可持续生产和资源开发模式,或都市化消费文化造成的。我们就尝试通过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方式,采用“社区支持三农,村民惠及居民”的城乡直接互惠互利的策略推动城乡社区可持续发展,使小农户摆脱贫困。

我们有两支社工队伍。其中一支社工队伍

用人类学的方法长期扎根村庄,通过与村民相伴同行,走进千家万户,访贫问苦,扎根穷苦苗子,发育社区领袖,然后依靠社区积极分子动员更多的村民组成互助组,当互助组成熟后,推动村民在政府注册成为合作社——我们称之为“农村组织起来”。很明显,我们的农民生产合作社是自下而上从底层发育起来的。合作社不是依靠村干部或乡村精英,而是由最贫困的妇女、农户组织起来,有人说我们是“另立中央”。这样的合作社才是真正的平民合作组织。当互助组建立后,我们会推动小组种植生态农副产品或经营乡村旅社等。当合作社生产出生态农副产品或准备好特色体验旅游项目时,我们及时推动城市消费者与乡村对接,实现互惠互利。

我们另一支社工队伍驻扎城市社区,建立消费者社区支持网络。为了将网络建立起来,我们在城市社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城市动员起来”。我们通过在城市设立公平贸易店直销合作社农副产品,店铺作为窗口也可以宣传城市体验游项目,以此凝聚消费者人气。我们还和广州市认同公平贸易、提倡健康生活、致力于环境保护的草根组织合作,成立“城乡汇”联盟。联盟除了积极举办各种社区沙龙、开展消费者教育活动外,还和广州大楼盘合作,在社区公共空间举办“城乡汇”市民农墟,在社区摆摊直销农副产品和宣传体验游项目,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促使消费者关注乡村,改变其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当城乡社区组织动员起来后,我们及时推动丰富多样的城乡互动活动——我们称之为“城乡互动起来”。我们将消费者带进农村参加形式多样的体验游活动,甚至推动城乡居民面对面议价——我们叫“参与式质量认证”或“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另类游客,消费者在体验游的过程中不仅向村民学习,而且吃住等费用直接结算给

农户,走的时候还向小农购买健康农副产品。这样消费者得到健康生活体验的同时,生产者得到劳动报酬,实现互惠互利(摆脱了中间商的剥削)。最可贵的是,我们还将生产者带进城市消费者的社区,参与自己的副产品的推广和交易,加深了城乡居民的相互信任和理解。

乡村生活体验游和农副产品公平交易改善了社区民众的生计,同时使村民们有机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社区的社会关系得到改善,老屋重生,传统手艺得到传承,妇女的家庭地位得以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组妇女合作经营乡村旅社,合作生产农副产品,以集体的力量与城市消费者议价、交易,以妇女小组的名义接待城里人并与其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经济互助过程中,村民与体验者之间,包括体验者彼此之间,城乡之间的信任关系得到改善;第二,在接待体验者的过程中,妇女之间必须分工与合作,因为任何单独的农户都无法完成繁复的组织和交易,这无疑强化了村落的邻里关系;第三,通过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方式开展城乡交易本身就具有互惠和减低城乡社会排斥的作用;第四,老屋再生、祠堂文化恢复、手艺传承等,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第五,项目的主体都是妇女,在她们经济能力增长的同时,其家庭地位也得到提升,性别权力关系开始改变;第六,随着越来越多城里人进村体验,村民们开始意识到好山好水的价值,开始有了环保意识。

项目运作了一年半时间,村民仅在生计方面的收益就达20余万元,最重要的是这个社区经济项目正如潘毅教授所言,体现了社会的主体性,因为社会的主体性体现在社区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村民有了主人翁意识。所以我们行动的一个方向就是通过社区的变革,特别是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当

越来越多的社区及其家庭有主体性有主人翁精神时,社区才会有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当越来越多的社区采取健康永续的生活方式时,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

苏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合作社到底能不能被看作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它到底是在促进社会经济,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我认为实际上它是在助推市场经济向农村、向一些偏远地区的蔓延。作为社工,是不是应该去考虑这样一些风险?

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我的问题牵扯到一个到海外做研究且在国内也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的社会要发育,首先应该让知识分子离开,知识分子在里面弄来弄去的话,问题就比较多。那么我想问,如果社工没有通过他们的理念和所在大学所学的一些关于社工的知识,农民作为其自身的一个社会主体,在乡村也好,在城市也好,他们能有你们所讲的主体的存在吗?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我的问题和这个类似,就是组织资源的问题。我非常愿意看到刚才的这个案例,因为我自己写过关于新乡土主义的文章,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梦,不可能实现,但实际上很多实验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即重新建构城乡互补的关系。我觉得任何实验都值得欢迎。只是说中山大学的这个实验的组织资源、资金都来自外部,我们也听到很多乡村建设的经验是以排除国家作为前提,那么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利用我们既定的政府组织资源来转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全部依靠外来资源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既定的组织资源有没有可能转变成为中国新乡土主义的一个组织资源

和资金资源——这是我的新乡土主义能否实现的一个前提。另外回应一下中国的特殊性是不是就一定跟国外不一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特别需要一个比较的实验证明西方的特殊性,而不是证明西方的普遍性,在西方特殊性的比较下才能发现我们自己的特殊性,而不是相反,不是为了以西方的特殊性为普遍性来证明中国必须走这个普遍性。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这个合作经济到底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补充,还是一种挑战?我更倾向理解它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挑战。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出现有点像是乌托邦的形态,但是我们要考虑今天的国家和资本已经高度结合在一起,怎么可能会提供一个条件出来搞乌托邦呢?所以说乌托邦的存在本身一定是一个社会运动,或者说社会经济一定是要通过社会运动这样一种努力才得以存在。这是让每个人参与进来才有可能开拓的一种空间,所以它的存在一定是对市场经济的挑战。

古学斌:对于刚才有人问到合作社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的问题,我也要回应下。当所谓共产主义阵型垮掉之后,资本主义好像变成唯一的道路,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合作经济或者社会经济其实是一种实践,它尝试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做学者不敢自夸说能做多大的事儿,我们的定位可能就是做一个试验,尝试去证明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如果这个试验成功而能够被政策制定者或其他人看到,他们愿意选取我们的模式的话,那么社会发展的转向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做倡导的工作。

至于我们是不是“润滑剂”,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社会工作通常被批评为制度做修修补补的工作,在社工里头的确有一种倾向是这样的,

譬如服务取向的社工,你有什么问题我就帮你解决一下,根本不触动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然而,另外一种社会工作却是回应整个结构性的问题,或者说挑战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他们试图做制度和结构的改变,这样就不只是修修补补那么简单了。

至于刚才有人问农民有没有主体性,没有学者进到农村可不可以,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我们在中国很多农村看到的例子很多,譬如山西永济农协就完全是自发的一个运动,是农民自我形成的组织,规模非常大,比我们的要大很多。全国各地农村的状况不太一样,如果都像永济农协那样,当然就不需要社工,这样说当然是非常乐观的。但如果我们在一些农村看到农民的意识还很淡薄,他们的主体性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我觉得社工可以做培育跟陪伴的工作,一步步提升他们的意识,建立他们的主体性。农民有主体性,我绝对相信,“外推”跟“内发”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同时存在。

至于资获取源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是不同途径的。从化这个项目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项目,跟我们在云南的项目完全不一样。云南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资源,用基金会的钱和研究经费在做。我们在尝试不一样的模式,看能不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张和清:对于社工组织或公益组织来说,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国内基金会或国家资源投放越来越多,而国外慈善资源越来越少。所以,作为公益慈善机构或社工机构就一定要与政府和企业基金会合作。我们绿耕在广东的项目主要从政府拿资源。但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当你得到政府支持时,有没有专业自觉或专业的独立性,能否持守社工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如果你不能坚持专业的独立性,很可能变成资源提供者的

守成者,不是向社区民众交代,而是向出资方交代。另外,在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机遇和资源非常多,只要机构长期坚守社区,为老百姓办实事,在社区民众中有良好口碑,政府或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会主动找上门来的。对公益机构而言,不是你说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老百姓是否买账。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认为NGO的发展非常好,非常重要,但是,要避免新自由主义对NGO的侵蚀,不要把NGO和国家完全对立起来。NGO的好处恰恰在于大家,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内,都主动做社会实验,这些实验如果结果好的话,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就来借鉴、吸取和推广。在2011年第9期《开放时代》的“专题”里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就是讲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它涉及17个县,要三年实现每个农户(不是平均)增收万元,而且是生态的,通过养鸡、种蘑菇这些办法。这个怎么能做到?这恰恰就靠在基层实验的基础上,各个县政府全面推动,包括所有干部都要住到农民家里去,帮助一家一户,这已作为县里干部的考核机制。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承认的劳动:工矿企业里的家属工作



宋磊认为可以在单位制度里寻找社会经济因素,我的报告就是讲单位里的家属工作,介绍在单位制度下,特别是在工矿企业里,家属工作是处于何种位置。之所以选择工矿企业入

手,是因为重工业是中国工业化的重心,家属工作首先也是在工矿企业里发展起来的。首先不要把社会主义抽象化,抽象成某一种“model”,也不能仅为了回应当下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二元论的思维,过分美化当年的体制。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讨论单位制度下为什么和怎么做家属工作的。单位制度下的家属工作与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企业制度里的家属工作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又折射出集体主义生产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结构性区别?

先看两个官方报导的煤矿工人家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集体主义的生产体制下。1961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一位名叫范玉花的“五好”家属的事迹。范玉花的事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把丈夫照顾得很好。用报纸上的话说,“老彭五十开外了,身体还敦敦实实的,下井干活,精壮小伙都顶不上他”,老彭只管上交工资,不管家事的,全部心思放在煤矿里。范玉花受表彰不是因为她把丈夫照顾好,而是因为丈夫身体好、下井挖煤生产好。范玉花的工作间接为社会主义生产作出了贡献。如果只是前者,与传统的贤妻良母就没有区别了。区别就在于传统的贤妻良母是对丈夫和家庭的贡献,而后者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贡献,国家承认这种劳动。范玉花事迹的第二个重点是,她不仅把丈夫照顾好,而且把邻居照顾得也很好。她的邻居当然也是一个工属。邻居生孩子需要坐月子,范玉花就照顾这个邻居坐月子,这个工属的丈夫没有歇一天工。《人民日报》这样称赞范玉花:“玉花虽然辛苦了一个月,给国家实实在在换下了一堆煤。”这个故事重心在于“多出煤”。范玉花受到国家表彰的,不是贤妻良母、友爱邻里的传统妇德,而是她的家内劳动对社会主义生产作出的贡献。为此,范玉花被评为“五好”模范家属。什么是“五好家属”?

1956年,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为配合大生产运动,在工人家属中开展“五好家属”的评选工作。“五好”,即五个标准,实质涵盖三个方面:一是针对家人,要求把丈夫照顾好,把孩子教养好;二是针对家属自己,要学习好,政治上要好;三是邻里互助好。

第二个煤矿家属的故事发生在2006年。2006年总工会的官网上挂出了一个题为“井下来了太太团”的报道。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淮北矿业集团工会组织了六名矿工家属下井探访她们的丈夫。探井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以前光听别人说井下有多辛苦,俺没看到,现在算是明白了,俺家的汉子不容易,回去我就把家里的大印交给他”,“以前老公回家除了吃饭睡觉都没别的活,孩子功课做不好好像根本不关他的事,为此我还跟他怄过气,现在想想真是不该。”生产单位想通过家属工作,让家属配合做好后勤,协助安全的工作。

官方媒体宣传这两个故事都是为了教育煤矿工人家属,其目的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样的,希望男性职工不要操心家事,只关注生产。这也说明,生产单位是非常清楚做好家属工作对生产是有帮助的。这是相同点,不同点在于:第一个故事,它的主体是家属,另外它承认家务劳动对生产的间接贡献,家属所做的工作具有“公”的性质,而不再是“私”人事务。第二个故事里,尽管生产单位延续着集体主义时期家属工作的传统,仍在行使教育职工家属的职能,但是,教育职工家属是企业帮助职工处理好私人生活,而不是职工家属帮助企业做好生产,是教育职工家属要体谅丈夫,而不是承认职工家属为企业生产作出了贡献。第二个故事想要帮助男性职工树立“养家人”的形象,职工家属承认男性养家人的家内权威地位,这样,家属就不烦职工,职工也就安心生产了。

通过这两个故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集体主义生产体制和市场经济生产体制的区别。我

用“集体主义”这个概念,是因为我觉得集体主义不仅是生产体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伦理价值。其内涵是“计划经济”、“毛时代”这些概念无法涵盖的。集体主义的生产体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公私相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下,生产单位要统筹兼顾生产与再生产。当然,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体制下,“再生产”仍然是为“生产”服务的,而不是为从事“再生产”的人服务,这一局限性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上午有老师讲到如何用公私观念来看待中国。我想回应的是,公私结构,绝不是只有公私分离的一种结构,公私并不是天然对立和对抗的。在集体主义生产体制里,“私”嵌入“公”之中,“个人”是整体中的部分,生产与再生产统筹兼顾,团结合作,所谓“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抓生活,绝不是单纯的福利和再分配的问题,而是抓生产关系的问题。在公私相嵌的结构里,尽管这种劳动仍是无酬的,但是,家务劳动的价值不仅被生产单位/国家“看见”,而且从事家务劳动的人——职工家属受国家表彰。为什么要强调家务劳动被看见呢?被看见是与承认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女权主义的批评中,最经常的批评是家务劳动“invisible”,即看不见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公私领域分离,家内劳动作为“私域”看不见。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家内劳动被认为与生产单位无关,企业和国家自然对此视而不见,也就不可能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

这里有一个非常吊诡的看似矛盾的现象。在集体主义体制下,家属,必须附属于职工家属、依附于家庭内的婚姻关系才能获得这一身份,但是同时,家属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身份,而且是被国家承认的政治身份。在五六十年代,职工家属是与女工、农妇相提并论的社会身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在生产与再生产分离的结构上,单位制度解体,职工作为个体劳动者被雇佣。但是,这种

个体化的背后却隐藏了大量女性开始走向家庭，依附于男人。同时男性养家人的形象被重塑，比如我们在第二个故事看到的。这是一种吊诡！

单位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某种意义上，是通过两种“私化”实现的，一种是所有制改造，一种是再生产职能的私人化。前一种“私化”，国内批评的声音已经很多了。后一种“私化”跟女性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批评的声音却鲜有听见。90年代中期，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企业不再办社会”，把所谓与生产无关的职能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构性分离。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传统上承担再生产职能的女职工被视为“劣质”劳动力而被“优化”下来了，大量女工下岗。与这种制度转型相配套，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强调个人能力和个人责任，“素质”话语开始盛行。原本，“企业不再办社会”并没有说要把再生产职能全部推给个人和家庭，而是说由单个生产单位承担的再生产职能由“社会”来公共承担。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急剧的全面市场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使再生产职能由职工个人承担，事实上不得不由家庭承担。比如，一个有0~3岁小孩子的城市双职工家庭，要么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雇保姆来解决照看孩子的问题，实行阶级分工；如果经济不能负担，只能通过请双方父母来帮助照料，实行代际分工。如果这两个方案都行不通的话，只能是夫妻之间的性别分工，通常是女性回家。这种所谓的家庭策略——自由选择的名义下的自主选择，实质上是制度性挤压下的被迫选择。如果说，90年代中期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强制性的个体化，这种强制性的个体化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把很多妇女重新推回家庭，召唤出/强化男权制的家庭结构。“妇女回家”、职业女性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岗女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农民工的廉价工资实际上都是生产与再生产相分离的同

一种结构制造出来的。再生产职能的个人化，在家庭内性别化的传统分工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之前，事实上变成了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化。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不仅需要召唤个人责任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会召唤孝亲扶助的传统家庭美德，最后我会给大家一个证据。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识形态的共存，实际上是服务于同一种经济体制。当然，再生产职能不仅是儿童养育，还包括养老、住房等问题。住房的市场化和高房价，同样在推生男系制的家庭财产制度，尽管是在个人财产制名义下推进的。这又是一种吊诡！

通过对上面两个故事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所有制之外，两种经济制度在安排生产与再生产方面是不同的。女性在两种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地位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再生产职能都由女性承担，这是相同的，但是，这种工作的性质和地位是不同的。有了这样一种比较的视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属工作。

接下来，我从理论、实践、政治三个层面来介绍集体主义时期家属及家属工作。在理论上，当时的妇联和工会，主要是妇联，建立了一套关于家务劳动和家属的理论。实践上，建立了一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工人社区，建立了一套家属工作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政治上，国家通过表彰模范家属，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赋予家属以崇高的政治荣誉。

家务劳动和家属的理论建构，是伴随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并非先有一套现成的理论去实践和搬照。在这个意义上，集体主义时期家务劳动的理论，可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于国际女权理论的一种贡献。此乃后话。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第一，承认职工家属的家务劳动是劳动，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家属及其家内劳动之所以能被国家看见和承认，是因为在公私相嵌型的结构里，

它相对于国家,超越了家庭跟丈夫的关系,成为国家/单位的职工家属,而不再仅仅是丈夫和家庭的家庭主妇。第二,承认家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直到1957年才有这种提法,之前只承认女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界定的,家务劳动只有进入生产的视域,成为生产关系中的一极时,家属才可能拥有工人阶级的身份。职工家属经历了从“寄生虫”向“工人阶级”身份转化的过程。1949~1952年,国家对家属的态度是负面的。认为职工家属是懒惰的,只会消费,拖丈夫的后腿,影响生产效率,所以做职工家属工作是为了教育家属理好家。到了1953年,国家开始逐渐从正面承认家属的家内劳动是为生产服务的,家务劳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越是注重生产,希望提高生产效率时,就越需要处理好再生产的问题。到了1956年前后,妇联领袖们开始理论化家务劳动,给家属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找到一个明确的位置。因为只从家属劳动的内容来看,倡导妇女安心家务劳动,伺候好老公孩子,跟传统的贤妻良母有什么区别?这不是跟生产劳动解放妇女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相悖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论问题。劳动,在社会主义中国,绝不是简单的谋生问题,而是有多重的意义:第一,劳动创造历史,你不是劳动者就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某种意义上,这种史观具有形而上的终极价值。第二,劳动光荣,这是道德问题。你不是劳动者,就是“寄生虫”。“寄生虫”不仅是道德否定,还是政治否定。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劳动者的国家,“寄生虫”意味着你的国家成员身份遭到了质疑。劳动者是一种政治身份,这是第三层含义。第四,在最低层次上,劳动才是谋生的手段。

妇联为什么必须要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事实是,女工只占很少一部分,绝大多数人口是家庭妇女。即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农业合作社里,农村妇女获得劳动者的身份,城市里,还有大量的家庭妇女存在。1949年在西柏坡的时候就确定了要把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的城市工作方针。进城之初,确实是想把一些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作为一支可资利用的劳动力,动员出来参加生产劳动。但是,国家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妇女出来工作之后,国家无力承担孩子公共养育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刚建国,国家财力尚不能负担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更是因为国家选择了一种高积累低消费快速工业化的发展策略。关于高积累低消费,我们经常会想到工农剪刀差、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消费品的匮乏。因为缺失性别视角,我们看不到低消费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妇女承担了大量无酬家务劳动来解决家庭成员的日用品需求,如自制的衣物鞋袜、食品,甚至通过家庭副业获得一部分副食品。所谓“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省”是实现工业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增长”跟“节约”往往是并提的。通过在再生产(也就是消费)方面的节约开支,投入到生产领域。这种发展策略决定了不仅不可能在再生产领域投入太多,而且需要动员妇女更节俭地管理好家务。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专辟一节谈节约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之间的关系。1957年的中国妇女“三大”提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作为妇运方针。恰恰是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背景下,出台了“双勤方针”,也是在这个时期,职工家属的政治声誉达到了最高峰。中国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全国职工家属大会”。其待遇是跟劳模待遇一样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妇联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出了对于家务劳动的系统化的理论阐释。

从理论渊源上讲,家属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家务劳动是劳动的理论首创,应该推到30年代的苏维埃时期。但是,系统化理论阐释是在50年代由妇联发展出来的。一方面承认家务劳动是劳动,使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家属获得了明确的劳动者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确立了家务劳动、社区内社会劳动、工厂内生产劳动的劳动等级。这样,既与生产劳动解放妇女的正统妇女解放理论兼容,又确立了一个妇女解放的路线图。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受限于社会经济条件,妇女最终的解放还是要通过走向生产劳动。这里的关键,不是区分“有酬劳动”还是“无酬劳动”,而是区分“生产”跟“劳动”。这跟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是不同的。承认家务劳动是劳动,开始具有社会性,但家务劳动还不是生产劳动。劳动是有等级的,职工家属在国家生活中有了她的政治地位,但是她的地位没有女工那样高。就像工人、农民都是劳动阶级,但是工农等级决定了谁是大哥,谁是老二。劳动的等级决定了劳动者的等级。但是,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和社会主义生产体制在处理家务劳动方面的确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家务劳动只能通过有酬化(市场逻辑)才能体现其价值,那么在集体主义生产体制内的家务劳动是通过政治承认实现的。这里的核心是承认。

在实践层面上,建立起了一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工人家属区。在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时候,就建立起了与城市社区相对分隔的工人社区。从物理空间上,我们也能看出集体主义生产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组织生产与再生产的两种不同组织方式。现在大量老工人家属区拆迁,从空间上开始进行公私领域的重构和拆分。当然,不能把这两个模式绝对化和标准化。许多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同样会供应食堂、宿舍。比如富士康,它的准军事化管理就包

括对员工宿舍的标准化。所以,不能以空间安排作为社会经济的判断,更不能说由生产单位处理了再生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经济了。最重要的是所有制、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集体主义的生产体制下,也存在生产与再生产在物理空间上的拆分,职工家属留守农村务农,男性职工在城市务工。但是,生产单位对居住在农村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属仍有扶助的责任和义务。这里的关键是所有制。还是用范玉花的故事来分析,范玉花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做好家务,她说:“随他爹在反动派煤窑里爬了八九年,落得没吃没穿,养肥的是资本家。而今,矿井是咱们自己的,大河水涨小河满嘛,国家越富,咱们的日子越好过,这就要靠咱们下劲干哩!让他爹吃得好,歇得好,给党给国家多出些煤,也是咱当家属的责任嘛。”这话是不是范玉花的原话,还是被加工过的,已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国家想通过范玉花的话传达给公众的信息。在个人、集体、国家相嵌型的结构里,共同体是一个包括“我”在内,以共同利益——眼前的和长远的未来的共同利益为承诺的。国家、社会、单位这些共同体不是一个凌驾于个人之上和之外的利维坦,个人就在共同体之内。这也就是为什么单位制里的老工人往往有强烈的共享意识。“我们”的共同体意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抓生活”是为了“促生产”,这是极重要的一个动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还要受到社会主义共同体伦理的道德约束。正是在这样一种结构里,“抓生活”才是生产关系,家务劳动才有了“公”的价值,被看见,被承认。生产与再生产的两类承担者因此具有了合作和团体的意味,尽管这两种劳动仍存在着等级。这是集体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所限定的。

在家属工作的管理体系上,工会对家属工作负责领导和管理责任。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会与妇

联在职工家属管理权和领导权方面曾经存在过交叠和冲突,1951年才明确了工会对职工家属工作的领导权。换言之,统筹生产和再生产的生产体制也是逐渐建立起来的。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的十部工会章程,一直到1978年的章程,家属工作一直是明确列入基层工会的工作任务的。之后,工会章程里不再出现“家属工作”这个词了。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公私相嵌的集体主义的单位制度向公私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的历史轨迹。

职工家属,除了在空间上的集中居住,成为一个社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职工家属委员会是其领导机构。职工家属不是以原子方式存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类建国运动,比如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对家属的组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与职工家属组织化相配套的是家属干部的培养。家属干部并不是专职干部。以北京为例,1950年设过专职干部,1953年就取消了。家属干部基本上是从家属积极分子中培养起来的。非职业官僚而是家属积极分子来组织和管理家属社区的意义在于,这是社区内部的自我管理。

就家属本身的工作内容而言,除了每个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还包括社区互助和副业生产。不同历史时期,家属工作的重心是有所侧重和转移的。1957年前,国家比较注重家属的家内劳动。1958年“大跃进”开始,国家动员家属走出家庭,在社区组建的小型工厂或是男职工所在的企业里从事辅助性的生产劳动。“大跃进”结束后,家属工作的重心重新回到家内劳动。但是到了1964年,两种生产方式之争上升到两条路线之争,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革命化”,即强调生产方式的集体化,家务劳动作为“私”在国家话语中消失了,但是国家仍然表彰职工家属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大庆家属是当时的典型。因为城市副

食供应不足,当时很多工矿企业有自己的农场,很多家属在农场从事农副业生产,逐渐形成了单位体制下的男工女农的模式。这种男工女农模式虽然也有劳动等级的问题,但是与市场条件下的男工女农的性质是不同的。不能忘记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下,同时还存在亦工亦农、工农互惠的相互支持和团结的性质。

社区互助是家属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使家属的家内工作有别于传统的妇女职事,具有了集体主义性质。从劳动的内容上看,家属的家内劳动与传统妇女的劳动无甚区别,只是劳动的空间,从家庭扩展到了社区里弄,但是这种劳动,性质是不同的。范玉花之所以成为“五好”模范家属,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邻里互助。但这种邻里互助的性质不是慈善和个人美德,而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邻里互助包括劳力互助和经济互助。劳力互助主要是社区里孩子老人、生育生病时的相互照料。另一个是经济互助。50年代储金会在职工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形下是帮困济贫的主要方式。1957年的工会章程明确把领导储金会和家属委员会作为基层工会的工作任务,可见储金会在当时的功用。家属区内的互助体现出了某种合作和团结的经济形态。另外,经济体制的转化也体现在话语表达上。阅读那个时期的材料,发现当时的语言主要使用的是“集体主义”这个词,几乎不用“公共”这个词。“集体”相对的是“个人”,“公共”相对的是“私人”。“个人”在“集体”之中。现代的公私观下,“私”在“公”之外。当时称“集体福利事业”,而不会说“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我们期待的是国家提供、公共享有。集体福利事业是靠集体成员自己创造的。50年代的集体福利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家属互助的集体方式来推进的,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国家/单位的供给。能直接享有单位福利供给的是极少数的单位里的全民女工。一方面,是基于当时

的客观情况。工业建设速度加快,工人队伍迅速增加,职工家属也随之增加,国家在住房、副产品供应,甚至教育、医疗等设施提供等方面都远远跟不上工人的需要,职工家属只能通过互助自救,当时就叫“家属自救”。另一方面,就像当年的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之华所说,“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事业,主要地就是组织群众自己的力量来为群众自己服务的事业”。在集体主义单位体制下的家属区里,为了满足共同的需求,互助合作既是其客观需要,也是集体主义伦理要求。竞争和利已不是这种社区里的运行规则。

在政治层面上,简单地讲,它是一种承认的政治。首先职工家属是一个看得见的社会身份,国家给予职工家属以崇高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地位。比如,职工家属高凤琴,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表彰模范家属。国家不仅单独表彰模范家属,1957年召开全国职工家属代表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她们,媒体大量报导她们的事迹。国家通过这些政治仪式和政治符号传达对家务劳动和家属的政治承认。另外,五六十年代的劳模大会里,是有模范家属这类模范类型的。农业和工业战线上的生产女劳模,我们仍然很熟悉,我们可能不太知道存在模范家属这类劳模。特别是,随着企业制度的改革,公私领域的重构,单位/国家对于家属工作不再承担责任,家属这个群体解体,国家不再对她们和她们的劳动提供制度性的承认。模范家属这类劳动模范几乎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了。

最后,我以两个故事结束我今天的报告,以呼应报告之初的两个故事。2011年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评选中有两位煤矿职工家属。一位叫张淑兰,七年来无怨无悔地照顾瘫痪的公公婆婆,被称为“矿工的好媳妇”。她的事迹被放在道德模范评选的官网(“中国文明网”)的“身边的感动”栏目下。另一位叫廉爱新,自27岁始,38年

来一直精心护理着因工伤而瘫痪在床的丈夫,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子女养育成人。她是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获得了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但是,她们不再是劳动模范,而是以道德模范的形象出现。她们的家内劳动已经跟生产毫无关联了,她们的劳动是私人性的,不再具有“公”的价值,是在“爱”的名义下的个人之情、道德之善。国家表彰她们的事迹,是为了“感动”我们的心灵,而不再是国家的政治承认。再生产领域已私人化,当国家从这个领域中撤离时,不仅需要召唤个人责任,同时也需要召唤传统的家庭美德。而这个领域至今仍与女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绝大部分妇女处于结构性不利。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与启示



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集体经济的案例,然后针对这个案例有一些简单的思考。

今天上午我们谈到了很多“失败”,比如说乡村建设的失败、计划经济的失败,甚至是市场经济的失败等等,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农村集体经济的失败。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几乎完全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更喜欢用“分田单干”这一更直白的表述)所取代。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说集体经济已经成为历史——那个曾经影响数亿中国农民生活和命运的集体经济制度已经终结。可是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呢?过去三十年中,人们一提到集体经济,就会提到平均主义“大锅饭”,认为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社员劳动积极

性下降,瓦解了集体经济的基础,而分田单干则成为解决劳动激励的最简便快捷的方法。更有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分析集体经济失败的原因,譬如林毅夫认为,农业劳动监督困难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进而导致劳动生产力下降。在这样的论述中,集体经济的失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且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逻辑。

不必否认,在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中,确实存在着包括“大锅饭”在内的很多问题,影响了集体经济的成效,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放回到它们所在的历史情境中,去发掘产生它们的历史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条件,看到制约集体经济的历史局限性,也才有可能在一个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启示和意义。我希望下面介绍周家庄案例能够对我们认识集体经济有所帮助。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地处冀中大平原,距离省会石家庄只有50公里。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如从过去的人民公社改称乡政府,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60年,是极少数没有中断的维持集体经济实践的村庄。

周家庄下辖六个自然村,分为十个生产队。根据2008年的统计,周家庄乡有4475户,13012人,耕地21046亩,整半劳动力6240个。到2008年底,合作社的集体公共积累余额将近3亿元。2009年周家庄所在的晋州市人均收入是7495元(包括城市人口的所有人),周家庄是8000多元,但是周家庄的统计口径不同,它采用的是“生活水平”这一经济概念,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所有投资都由集体负担,“生活水平”真正是农民可支配的纯收入。仅就此衡量,周家庄的发展水平已经

在当地处于领先地位。

周家庄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气候下坚持集体经济制度,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它有雷金河这样的领导人。雷金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50年代初他曾作为劳动模范参加全国的棉花生产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被称作“冀中一杰”。雷金河为人刚直,在当地有威望和地位。1982年,雷金河顶住自上而下的压力,带领社员一起做出不分田的决定。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在集体时代就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1982年周家庄社员一天劳动所得达到5.5元,远高于本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集体经济带来的好处让周家庄人最终决定不分田单干,仍然维持合作社体制不变。

周家庄合作社是如何避免其他人民公社遇到的“大锅饭”问题,而让社员保持较高的劳动积极性呢?奥秘就在于它实行的“定包奖”制度,即责权利相统一的定额管理、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奖减罚制度。在这套周家庄自50年代就已实行的生产管理制度中,劳动定额是基础和关键,它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中等劳动力用通常的劳动强度工作,在单位时间内所应完成的一定质量的某项作业的数量。劳动定额的形成经过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随着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它的精细。例如在90年代,劳动定额将整个农业生产的活计分为10类、13级,一共是300多项,仅仅是整地类就有36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定包奖”制度彻底解决了劳动生产的监督问题,每一项农活、每一道工序都会有与之对应的工作量,不存在所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

今天的周家庄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块。农业由各个生产队负责,主

要分为大田粮食生产和果园的梨树、葡萄等种植。前面提到有两万多亩耕地,其中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大约是七八千亩,其他的多数是果园。大田粮食生产已经高度机械化,播种机、收割机等各种农用机械应有尽有。工业是由乡企业办公室管理,包括阀门厂、印刷厂、建筑队、纸箱厂等等。每个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由于时间原因我不去讲更多细节了,下面我谈谈周家庄集体经济实践的一些特点。一是高效的农业生产。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2009年,周家庄农业劳动力一年的人均分红达到两万元左右。二是工农业生产的相互促进。初期是以农补工,在五六十年代,周家庄是我国的一个棉花生产基地。我们知道在集体时代棉花这种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要比粮食的收购价格高得多,经济效益也要好得多。周家庄正是通过棉花生产积累了自身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后期是以工补农,周家庄从1990年开始就不再收取农业提留款,反过来从工业利润中拿出钱来补助农业,以缩小工农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今天农业劳动力的年收入仍然低于工业劳动力,但合作社通过综合调控,将差距维持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三是集体为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撑。周家庄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向银行贷款,需要投入新设备和项目时都是向合作社申请,批准之后直接拨款。我们知道,今天的农村在开展农业产业化或者是发展工业项目时最先碰到的就是资金困难,农村信用社或银行从分散的农户那里吸纳存款,而当农民需要资金时却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周家庄由于有这样一个集体经济的制度,实际上就拥有了一个非常有利于自身工业积累的金融环境。

我最愿意在这里强调,同时也是和这次会议主题非常契合的特点是,周家庄实现了共同富

裕。周家庄有个口号:“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家受罪。”在这个村子里,特别富裕的人家很少,但也不会有特别穷的人,老百姓住的房子普遍是两层楼,两百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楼房差不多建于八九十年代,今天看来略显陈旧,但是居住舒适。工厂里工人一年收入平均在两万元出头,农田里农民一年收入通常在15000元左右,有的年份会高一些,比如2009年就达到了两万元左右,果园由于多采取专业承包,果农收入差距略大一些。整体看,除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障其成员生计的需要。这里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周家庄我们很容易看到70岁的老爷爷在乡政府里扫地,在仓库里看门,在地里检查农活质量。一般来讲,老人只要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合作社都会安排他们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获得一万到两万元的收入。工厂的目标也不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最大限度地解决社区成员的就业。我们曾到阀门厂去做访谈,了解到阀门厂几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为了吸收周家庄新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

毫无疑问,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是比较成功的个案,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也不具代表性。我对周家庄个案的介绍,呈现了它平稳发展、延续至今的一些做法和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样的做法和条件可能在其他很多合作社那里都不具备。我认为,这样处理周家庄个案,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逻辑,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判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集体经济的想象。

前面提到了周家庄施行的“定包奖”生产管理制度,人们自然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历史上其他很多合作社没有能够施行类似的生产管理制度?我的初步观察是,这一方面和合作社的领导素质和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另外一方面也与合作社的成长空间是否够大有关系。

回顾中国合作化的历史,在从小农经济走向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农民失去了私有的土地,失去了沿袭已久的劳动和生活方式,骤然进入到集体劳作、集体分配的新型生产方式中,这种巨变很容易导致农民的不适应,甚至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能否健康发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获得一个足够大的成长空间,如果迈向合作社的转化能够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农民就更愿意抑制诸多可能对集体生产造成负面影响的小生产者意识和习惯,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生产管理制度的建设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农村的合作化是在整体经济水平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起步的,并且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承担服务国家工业化的重任。这样一来,新生的合作社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非常严苛的成长环境中。低价的粮食高征购让辛苦劳作的社员看不到生活水平(尤其是粮食消费水平)的明显提高,因而也看不到集体经济的成效。在一个人们普遍处于生存水准的农业社区里,即便精细的生产管理制度能够出台,也很难想象它可以严格实施。或许,我们可以说农业劳动监督的困难并不在于技术上的“不能”,而是在于生存伦理支配下的“不为”。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话说,那些当年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缺失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

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

刘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广东崖口集体经济的实践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的崖口村却决定依旧走集体生产、共同致富的道路,到如今已三十多年了。今天在崖

口,参加生产的村民依然会把自己称为“社员”,把村委叫做“大队”。作为一个按照公社制度运行的经济组织,崖口具有鲜明的特点:它具有开放性,村民可以自由择业,可以离开村庄去外地打工经商,不如意时可以回到村里参加生产。它的组织规模几十年来不断变化。比如在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村庄,但是80年代中期之后,出去打工的村民不断增多,组织的规模慢慢缩小,今天参加集体生产的人只占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不过大队的很多福利是面向所有村民的。比如给长者和未成年人提供免费口粮,村里无人或者家人无力照顾的老人,可以住进老人院,而一切费用由大队承担。

崖口下辖八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按报名参加劳动的人数分成一到两个生产队,生产管理分两级进行。大队主要负责大型的农业机械、水利设施或者种植面积、种植结构,还有补贴政策的制定等。生产队负责安排具体的生产活动和田间管理。每个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和记分员,此外还有一个对技术要求颇高的排灌,由各生产队自行选出。由于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崖口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很高,虽然村里规定每个社员

每天的劳动时间为四个小时,但事实上两小时就可以完成。生产队长和记分员会记下各个社员出工的情况,一般来说,社员们都是集体出工,若碰上只需少量人手的情况,生产队长会根据自愿以及公平的原则来安排,尽可能缩小生产队内部的收入差距。

每个月底记分员会把当月所有社员的出工及相应的工分进行总结,并把结果贴在公告栏进行核对。崖口的工分制在操作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且在设定各工种相应的工分方面体现了很强的“民主”。其灵活性首先表现在大队没有“一刀切”,而是将工分决定权交与各生产队,由各生产队自行制定和调整。各生产队会根据工种不同的性质,通过投标、计件或包干等方式来确定其工分。一般而言,某项工种(尤其是所有社员同时参与的那些工种,比如除稗、施肥等),工分一旦确定下来就不会改变。调整主要针对新情况,比如抢收时晒谷人手不够,割禾的社员不得不参与晒谷;或者因为责任重大没人愿意排灌,就必须提高工分以示激励,等等。工分制的“民主”表现在工分调整的过程中。每年11月底各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参加的“年终总结会”,社员们会针对新情况展开讨论(常常发展为激烈的争论),生产队长这时只能充当协调员,帮助争论的双方(有时是多方)沟通,然后向所有社员宣布最后达成的协议。

农业生产在崖口经济中只占很小的部分。由于农业产值低、利润小,崖口采取了对农业进行补贴的方式来维持其运作。每到收获之后,大队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各生产队生产的粮食,然后又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基本口粮出售给参加劳动的村民,其余的粮食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高价收购、低价售出的补贴方式之所以可行,在于崖口几十年来围垦出了近四万亩土地,其租金成为村庄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必

须指出的是,在崖口参加农业劳动的大多是文化层次偏低、缺乏在外谋生技能的中年人,或者其他打工失败只好返乡务农的村民,只有他们才有权享有这种补贴,而这种向劳动者明显倾斜的分配方式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思想。这种以“市场经济养集体经济,以资本主义养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崖口的另一独特之处。

**李昌平(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社会企业和社区共同体经济是农村社会建设的
经济基础和重要主体**



谢谢大家给我发言机会。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农村的社会企业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村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的主体。我会结合我最近几年农村的实验。

当下中国农村是由一个一个的村社构成的,村社共同体是农村社会建设和治理的基本的主体。宪法规定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村社自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传统农村社会,有家族血缘确定的长幼尊卑社会关系作为家族自治的社会基础,家族的财产是家族自治的经济基础。这样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经济基础。现在的农村,村社共同体自治替代了家族共同体自治。它缺少传统的长幼尊卑的血缘关系,如果这个村社共同体没有共有的财产,那么这个村社的建设和治理靠什么基础做支撑呢?从理论上讲是讲得通的,《宪法》规定的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一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基本经营制度是村社自治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个中间就是有

一个产权做基础,比如集体经济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作为共同体自治的基础。问题在于实际上我们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发现已经有绝大多数(至少90%以上)的村社,其集体所有制已经名存实亡了,集体经济已经完全私有化,那么支撑这个村社共同体建设和自治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就像我们小岗村,你无论派多少个沈浩去,它就是不行。今年派了43个国家干部住在小岗村,你也拿这个小岗村没有办法。如果村社共同体没有基础了,这个共同体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的农村如果没有了村社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无主体社会了。今天农村社会已经(很多但不是绝对的)是无主体社会了。我们看到很多村庄,包括我们自己故乡的一切都在崩溃之中,如伦理、道德、孝道、礼仪、廉耻、传统信仰、公平正义、社区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农田水利。大家都喜欢民主自治,在理论层面我们都说民主自治很重要,但是今天的农村的所谓民主自治是倒退的,80年代乡村的民主自治比现在好多了。

农村社区建设必须重建村社共同体。中国的小农,是要有所依附的,或依附于家族,或依附于士绅,或依附于资本,或依附于政府,或依附于党的组织,看来这个现在都不现实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些人挣钱了回报自己的家乡搞些建设是有的,但是极个别的。当下中国的小农,只有一种制度性的可能选择——依附于村社共同体。这是由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决定的,因为我们的宪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建设和治理,必须重建“村社村民共同体”——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建设和治理的主体。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村社村民共同体。我把它定义为“经济发展、社区发展、社区治理”三位一体的社区型农民组织。经济发展是为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社区建设和治理反过来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今天的大寨就是这种情况。这三位一体存在的基础是“四权”统一——有共有的产权、财权、事权、治权。我们的改革开放,改革的核心就是把这“四权”搞得不统一,把前面两权,财权和产权搞得没有。有事权无治权,只剩下事权了,另外的三权都没有了。所以一个小岗村无论派多少国家干部过去,也搞不好。全国各地还有几千个维持村社共同体(坚持集体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四权”统一的村子,不需要中央派工作队,每年都有一个村长论坛。今年的村长论坛在山东临沂举行,有一千多个村长过去,都是集体经济好、村社共同体比较完整的村社。今年开会的时候我也在临沂,那些村子开会所说的话语体系跟我们的话语体系完全不同,那才是真正的自治体。他们是正儿八经在搞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搞得很好,因为他们是“四权”统一的村社共同体。

大寨是今天中国农村村社共同体的样板。它的村两委、合作社、公司以及很多内部部门等,都统一于村社村民共同体内,都不能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现在的公司加农户等等是把公司凌驾于农民共同体之上,大寨不是这样子。在大寨,资本等都要服从村社共同体,都要为村社共同体服务。它不排斥公司,不排斥合作社,也不排斥外来资本进入大寨。大寨经济发展是为了大寨社区建设和治理,大寨社区建设和治理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大寨共同体经济发展,它的“四权”是统一的。在山西,大寨是自然资源非常贫乏的村庄,可是大寨不仅民生好,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也很好,有伦理,有道德,有孝道,有礼仪,有公平正义,也有民主自治,是非常繁荣而和谐的社区。大寨周围的很多村庄有丰富的煤矿等自然资源,挖了,少数人发财了,煤变成了少数人在北京、上海的房子,甚至变成了美圆资产,不仅村庄建设和治理无人问津,民生也很凋敝,黑社会控

制等问题非常普遍,社区极不和谐。我和于建嵘走得很近,我们是好朋友。于建嵘以前老大不喜欢大寨、华西、南街等村子,有一次我和他争论得很激烈,我要他去看了以后再批评人家。结果他就去了大寨,看了大寨和周围的村子,深受启发,觉得大寨的道路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了南街,在南街待了五天,快走的时候让我跟南街联系,说要见王宏斌。我就跟王宏斌打电话,王宏斌就接见了于建嵘。于建嵘很感慨:“我们懂的王宏斌都懂,王宏斌懂的我们不懂。”过几天于建嵘跑到华西村去了,在华西村待了一个星期,跟我说要见吴协恩。见到吴协恩了,最后回来于建嵘就和我谈,坚持集体所有制和发展集体经济,巩固村社共同体的主体性,是农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一个选项。这是个进步。我们看了大寨和周围的村庄,比较之后就知道谁对谁错,这没有什么理论不理论的,一看就一目了然。

大寨村社共同体经济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一种。大寨村社共同体发展经济是为了共同富裕,让社区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社区不仅生活好、环境美,而且和谐、有秩序。

我觉得再次学大寨,要从重建社会经济——集体经济做起。经过三十年改革,资本服务于社会转变为资本奴役社会,当然这不是改革开放的全部,但就农村来讲,就是这样。中国农村社会建设和治理,需要再次学大寨——重建千千万万的村社共同体。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大寨,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时代的学大寨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学大寨,就是实践邓小平所倡导的“两次飞跃”——共同富裕——资本为人和社区服务。现在学大寨,是要恢复和完善村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以此发展新的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社会经济。经济的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或者说社区的性质。村社集体经济不仅是农村社会建设和治理的

经济基础,还是支撑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重建村社共同体需要社会工作者和社会资本下乡,要鼓励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下乡,要促进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全国各地也有些点。我们在信阳成立两个机构,一个是乡村规划设计院,就设在信阳一个村子里面,专门从事规划设计;另一个是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是一个志愿者联盟,专门为协作者、志愿者提供服务。我们在信阳协助一些村社成立了养老资金互助社,就是一个老人出两千块钱,我李昌平带几万块钱放进去,我在社会上找些钱放进去,村子里面有钱的人也放两万块钱进去,叫“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去年每个老人分了570块钱,估计今年每个老人至少可以分800块钱。这样一个老人、一家一户就有千把块钱过年,社区里面的孝道也回来了,社区也就和谐了。

养老资金互助社就是社会经济。有了养老资金互助社以后,村民可以拿自己地抵押贷款,农村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社区内部的公共服务也能逐步恢复起来。当地政府问昌平能不能帮我们搞下新农村建设,后来我们组织孙君等一班人开始搞新农村建设。我们成立的乡村建设规划设计院就是一个社会企业,帮助村里建设村社共同体,搞旧房改造、道路水系规划和建设、产业调整、垃圾分类回收,现在村里面一点儿垃圾也没有。我们还协作村社共同体搞养老产业和乡村旅游等。

农村是需要资本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和为农村社会服务的社会企业资本,应该节制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下乡。

谢谢大家!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从两个对比看今天农村合作社的问题



题目中所指的两个对比,第一个是把我们中国现在农村的合作社和我们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做一个对比;第二个是把我们的今天的合作社,我讲的是主流的合作社,和我去挪威看到的一个案例进行对比。两个对比是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呢?

我先用广东省的案例来介绍一下今天农村合作社常见的问题。通过香港理工大学与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珠三角—香港跨境社会经济,我们在广东省农村做了二十多个合作社的调研。在此前还组织过两次合作社论坛,和广东合作社的带头人有广泛的接触。

这里我讲的一个案例很寻常。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有机稻米合作社,叫“金田合作社”。政府有两个部门在做合作社的推动扶助工作,一个是农业局,一个是供销合作社。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部门,比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团委在做一些青年工作,推动青年创业,跟合作社的推动也有交叉。金田合作社是农业局扶助下的一个合作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合作:农资(稻种、生态农药和生态肥料)购买和有机稻销售、农机、稻米加工。有机稻主要是农户生产为主,推广稻田养鸭。2009年合作社的有机水稻约1325亩,总产量达450吨,按保护价150元/百斤收购。包装成品1斤可以卖到8块钱。2010年的时候种有机稻米和种常规稻的差别,大概是每亩可增加收入400块钱。该合作社的农机合作是县里指定的农机代售点。稻米加工以前是由其他加工厂来做,合作社贴上自己的标签。后来合作社希望由自己来做稻米加工,把这一块的利润留给自己,所以

在筹备加工厂。合作社的带头人是一个种田大户,他自己流转了上百亩的土地,在当地一年的流转价格大概是100~300元/亩。这些是我们报纸上可能会读到的关于一个合作社的报道。

这里面究竟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实际下去看,情况又是这样的,显露出几方面的问题:

合作社的虚实问题:这个合作社对你说它有多少亩地,有多少社员,这些都是虚的。为什么呢?最后合作社在收购有机稻米的时候,不管是社员还是非社员,能收则收,有时候社员也不一定卖给他们,而非社员也可能卖给他们,所以社员和非社员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如果你问起,他会给你一个数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不管这个东西的。所以在农资购买和产品收购上会员没有进行合作。

合作社的性质问题:农机合作其实是合作社的带头人以合作社的名义成为县里的农机代售点,销售一台机器可以得100块钱的利润,但是这一块儿是没有给大家分的。至于合作社的稻米加工厂,预算大概需150万块钱的投资,去年有合作社的五个骨干筹到了40多万块钱,还有三家企业有投资的意向。这个加工厂建成后会是什么状况呢?会跟现在把稻米加工承包出去一样,稻米收购之后的加工、销售,完全和普通社员没有关系。这个加工厂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在筹资和运作,但是最后实际是这几个投资人的“合作社”。所以农机合作和稻米加工是在合作社的虚名上架起了几个股东所有的小企业的架构。

凝聚力、积极性、民主参与问题:如果进村和村民去谈,你会发现村民对合作社没有热情,没有积极性。有的村民甚至说:“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跟着搞,现在后悔了,就是他们自己赚钱,我们就是帮他们赚钱。”稻田养鸭是生态种养循环的措施,鸭子是当地政府支持给他们的,但合作社在分鸭的时候有不公,看关系,关系好的分

的鸭比较多,关系不好的分的鸭比较少,甚至没有。分红有没有呢?没有。合作社账务有没有公开呢?也没有。农民不知道合作社究竟有没有赚钱,赚了多少钱,大家是不是能得到好处。农户基本上对合作社是不清楚,不信任,不在乎。

合作社与市场问题:在提供杂交稻种上,合作社没有做起来,因为没有明显的优惠,加上对稻种的偏好个人不一样,且因他们离县城不远,很多农民还是愿意去县城买。农民生产的稻米是由合作社来收购,但在收获的时候各路商贩也下乡收购,和合作社有竞争关系。就算合作社价钱高一点,但是如果合作社的现金流出了问题,不能马上兑现,商贩马上乘虚而入。因为天气不稳定,粮食打下来之后堆放可能会对品质有影响,所以农民就不愿意冒险等待,宁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商贩就有市场。

上述问题在广东农村合作社中是比较普遍的。它是一个大户掌控的合作社。对于比较熟悉合作社的人来说,对这个状况都不会陌生。这些合作社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假合作社”,是因为其实践与合作社原则相去比较远。有人认为像这样的“假合作社”注册的达80%,甚至90%。2010年在我们操办的合作社论坛上有过关于真假合作社的辩论,刘老石提出来这不是真假问题,而是规范的问题。

我这里先不参与真假的辩论。我们起码可以说这是一个社员参与度非常低的合作社。一些大家认为是真的、做得比较早和好的合作社,也面临参与程度低的问题。有一个有名的合作社,全村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参与进去。

那么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大户掌控的合作社在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而且普遍?讨论合作社,既要谈应然,也要分析实然。我这里就是讲实然的状况,提出的问题是:合作社所存在和生长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什么?这个环境如何影响了合

作社的运作?

我先讲一下广东农村合作社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出生的。现在的农业生产是农户的商品化生产和农业公司的资本化生产并存的过程。除了不计自己的劳动力成本外,农户生产已经彻底商品化,听农民计算生产成本就会很清楚这一点。农业雇工的日常化是农村劳动力已经普遍商品化的表现,民间互惠换工几乎萎缩。农业资本化在各乡镇甚至村庄都有,有下乡资本,也有在乡资本。在这个环境中,大户发起合作社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在市场经济中做强、做大、规模化。因为大户的资源仍然有限,在市场上不太可能通过其资本优势来规模化,那么他需要其他的农户参与进来。其他农户就是他规模化中的一个要素,合作化是大户参与市场竞争的规模化的一个途径。大户也把政府视为资源。有合作社这个筐,他们可以把政府资源往里装,找政府申请项目补贴、培训赞助等等。他们是用合作社这个盆子来接政府落下的雨。那么政府在合作社的推动中起什么作用呢?政府现在都不去发动群众,基本上没有,至少我们在广东这边没有看到。合作社的成立是农业局引导的。不发动群众怎么去推动合作社呢?农业局就找到乡镇,乡镇再找到村,最后落实到当地的专业大户或者村委带头成立。农业局的干部说这些人一般是比较熟悉的,或者关系比较好的。政府对合作社的定位也是以市场竞争中规模化为目标,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为带头人提供创业培训,如一年一次,一次一个星期,吃住在当地党校。培训的对象是合作社带头人、企业主、龙头企业主、农村的种养殖大户。由此看出,政府把合作社看成一个市场企业或准企业,把它作为市场活动中的一分子进行培养的。尽管政府可能给合作社提供一些资金,但在监管方面,是无为而治。合作社不用交税,税务局也不会去查。干部说合作社主要是靠

内部监管。这是今天催生农村合作社的环境,这个环境决定了合作社为名、企业为实现象不是偶然的。

我认为上面所提到的合作社的具体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对内的和对外的。对外的方面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它作为一个弱势主体的问题,大部分合作社还是市场中的一叶扁舟,会受到市场的挤压,会被市场抛上来抛下去。对内的是一个民主管理的问题,农民不太认同它,不太在乎它,因为基本农户没有发言权,同时又因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弱势主体,合作社能提供的实际好处也很少,所以农民也不在乎它。我想从两个对比来思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比一下我们50年代的合作社有助于我们思考合作社对内的民主管理问题。

合作社如何进行民主管理?我们来看一下山西西沟村50年代初期合作化的过程。山西的合作化走在全国的前面,在中央还举棋不定的时候合作化就开始了。中国在50年代初期有四大自由,即土地买卖、高低贷、雇工、市场自由。农户规模小,土地有再次集中的风险,也有失地农民流向市场的问题。除了土地买卖自由,其他自由今天的农村都有。与当今不同的是,西沟村在建立互助组的时候是以贫农为主干力量,在成立初级社的时候发动全体讨论,这样农民从道理上认识到为什么要合作。这些在我们目前很多的合作社是完全看不到的。西沟的合作运动在成长、扩大的过程中产生了按劳和按资(土地)的矛盾,很多地少劳多的农户认为既然增加劳动力投入是合作社扩大规模、提高生产的主要因素,那么按劳分配的收入增长低于按土地分配的收入增长是不公平的,是“死土地剥削活劳力”。在当时的实践中,也许最能凸现民主参与的就是按土地和按劳分配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按劳分配的份额得以扩大,按土地分配的份额逐步缩小。西

沟村初级社的土地分红从36%降到32%的死地租,最后取消了这个土地分红。因时间关系,具体过程我就不讲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西沟村志》。有争论、有斗争,说明有积极的参与,而且相对于当时的土地富裕户,地少的农户敢抗争,敢于改变现实。人们现在总结中国前三十年是“劳动替代资本”的发展,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动员和依靠中国充足的劳动力进行发展,但是很少人讲“劳动替代资本”的前提是以劳动者为重的共同体的建立,具体说来就体现在50年代西沟村合作化过程中劳动者敢于争取收益,敢于追求平等,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了按劳和按资的矛盾,以此推动合作从量变走向质变。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劳动话语权,没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共同体,谁愿意去卖命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土地分红收益增长大于劳动分红的时候,“劳多地少”的农户觉得被“劳少地多”的农户剥削,不公平。如果合作运动不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必然影响劳动积极性,阻碍生产发展,甚至导致共同体的破裂。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未能以劳动替代资本的反面经验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是依靠资本、动员资本、以资本利益为重的发展,体现在合作社上是大户掌控的问题,是资本排挤劳动的话语权的问题,具体体现为合作社的虚实问题、缺乏透明度、缺乏民主参与的问题。

合作社与市场的关系,是合作社对外的一面。所有的合作社都面临和市场对接的问题,市场的不稳定和无序竞争对合作社的影响非常大。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6月我去挪威时,有机会了解了挪威的奶农合作社,发现它有这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个全国性的合作社,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全国市场。这里必须提到一个前提,就是挪威的奶制品市场是没有开放的,没有参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外面的奶制品可以进来,但是

受调控。第二,合作社给会员提供保护价。这是合作社每年跟超市等相关利益方谈判的成果。因此奶农对生产收益有预期,并能得到保障。第三,为了使保护价真正有效,合作社必须根据市场需求要求每个农户定额生产,以防止生产过剩,价格被压低。在市场的条件下,挪威的奶农合作社演绎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每个农户其实是按计划去生产。很多人今天听到计划经济很害怕,对统购统销很害怕,但是统购统销在另一种情形下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有保护的市场,有计划的生产,有保证的预期,而整个过程是全国性的。虽然地区会议也重要,但是合作社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行业运筹计划的。基于历史的对比和对外的借鉴,可以使我们对今天合作社的问题和困境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可能会使我们看到一些出路。

谢谢!

严海蓉:有个问题请教李昌平。我们发现中国的集体经济很多方面都抬不起头来,即在国家和整个大的社会话语体系下抬不起头来。那么,我们大家能不能想一想怎么让中国的集体经济在今天的中国抬起头来,比如说把大寨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新的参照,我非常支持,但是首先怎么让集体经济抬起头来,你在这个方面有没有想法?

李昌平:这要从改革开放的初期说起。它本身是去公社化,就是从左的方向和从右的方向走的一个过程。你也相信吧,中国在一党制条件下是左搞一下右搞一下。我相信一段时间后,关于集体、关于集体经济、关于村社共同体也会主流化的。小岗村未来一定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这是肯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包括集体企业不允许登记,包括合作社不允许登

记(准许合作社登记是2007年以后的事儿),是要去毛化。去毛化了,有了新权威和成绩,但问题没少有。怎么办呢?咱们搞一点左的东西,把右的问题解决掉,左解放右的生产力,右解放左的生产力,改革否定革命,革命否定改革,在一党制的条件下就是这样子。

何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族群网络与边境经济



我今天向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族群网络与边境经济,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即GMS国家族群跨国流动的田野调查个案,呈现族群这一社会文化群体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时讨论族群或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个案1:云南河口香蕉种植园

种植园在中越边境线上的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主要种植香蕉,产品销往中国各地。种植园主为瑶族。种植园聘用长期工人为25人左右,其中,来自越南的瑶族有8人,来自中国的瑶族有7人、哈尼族有8人、汉族有2人。在香蕉收割季节,种植园聘用的工人可达70多人,其中约有四分之一为来自越南老街省的瑶族。种植园主说,在工人中,哈尼族最勤劳,工作很主动。当我们追问为什么还要聘用这么多瑶族人时,他回答说,与自己属于同一个民族,语言相同,沟通容易。此案例体现了族群网络在跨国劳动流动中的作用。

个案2:泰国清莱府苗族苗绣加工合作社

为了与国际禁毒计划相配合,泰国推出了替代种植罂粟、促进北部山地民族发展的“国王计

划”。在这一计划中,泰国北部清莱府的一个苗族村寨申请的苗绣绣片加工项目获得批准。苗绣是苗族的传统手工艺,在手工纺织的麻布制成的服饰上绣图案。近年来,因大麻可以提炼麻黄素等毒品,国际社会禁止大麻种植,苗族传统服饰的原料来源趋于枯竭,加之现代性的扩散,苗族服饰的原料由手工纺织的麻布向机器纺织的棉布或化纤布料所替代,传统手工纺织的麻布服饰趋于消亡。根据这一情况,合作社从缅甸、老挝和中国的苗族村寨中收购穿旧和穿破的苗绣服饰,经过裁剪缝制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挎包等旅游商品,送往清迈、曼谷等城市的旅游市场销售。这个案例是运用族群网络跨国收购原材料的经营模式。

个案3:缅甸大其力的中国阿卡人

阿卡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双版纳、老挝、缅甸和泰国等地。中国云南勐腊籍阿卡人ZYL,28岁,因家里的土地出租给别人种橡胶,在家中无事可做,听家里人说有舅舅在缅甸大其力,就沿着亲戚的线路经过老挝到达缅甸大其力住在舅舅家。舅舅家的村子主要居住着阿卡人,因语言相通,习惯相同,他很快融入缅甸阿卡村,后与村子里的阿卡姑娘谈恋爱并结婚,获得了缅甸身份证,分到了土地。他成为拥有两国国籍、跨国占有生产资料的人。

以上案例表明,中国西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边境地区的经济活动,蕴含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当代的边境经济受制于市场化的作用和全球化的影响。个案1的香蕉种植园的产品市场远远超出了地方市场而成为跨省区的大市场,市场的不断扩大创造出不断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国内劳动力市场不能满足其需求时就扩大到邻国劳动力市场;个案2的苗绣合作社更明显地体现出全球化时代旅游业发展和文化消费需求增长的

趋势,其产品的销售对象不仅不是本族群,而且主体不是本国人,而是外国的观光客。边境经济活动的深层动力来自市场化和全球化。

与此同时,边境经济并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的活动,它与族群网络具有密切关联。中国西南边疆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山水相连,许多民族跨国而居,形成了由族缘构成的跨国社会网络。据抽样调查,与越南和老挝两国接壤的云南省江城曲水乡,36.7%的家庭有越南亲戚,26.7%的家庭有老挝亲戚,约10%的家庭既有越南亲戚,也有老挝亲戚。上述三个个案的经济活动都是以族缘为基础运行的。以族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目前边民的经济活动提供了进行差异性经济竞争的社会资源。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互嵌”的关系,但在具体情境下,“互嵌”的社会和经济的地位、功能存在着或多或少甚至根本性的差异。在上述三个个案中,经济是目的,社会是手段,由族缘建构的社会网络被经济利益所操控。在许多学者所倡导的“社会经济”——我的理解是基本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之中,经济与社会融为一体,用社会或群体为单元组织经济活动,经济为服务于社会的手段,增益社会整体福祉才是最终目的。但在实践中,成功者寥寥,至少我的直接经验是如此。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以至于为了追逐个体或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的确必须批判并予以校正。然而,如何让经济与社会之间达成一致、人之“利己”本性与“利群”本性之间获得平衡,恐怕不是“社会经济”所能完全解决的。

夏循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作为酵母的社会关系——一个被馒头改变的乡镇

陈凯歌的《无极》惹来开涮篇《一个馒头引发



的血案》，我今天想讲的是一个被馒头改变的乡镇。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讲这样一个故事。我几乎没有做任何理论的东西，只是想讲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从1990年左右开始，这个乡镇开始

做馒头，形成较大规模的以馒头为生的群体，我是最早一批观察到这个现象的人。其次，我家里的很多亲戚，很多堂兄堂弟，包括几乎所有的侄子侄女都在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一直想将这样一个现象呈现给大家。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毛市镇。毛市镇在监利县中部，是传统产粮区。关于这个县的一些概述可以参考李昌平的那本《我向总理说实话》。基本的概况是人均耕地1亩左右（有看到数据是1.5亩，但是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多。我小时候就当过农民，好像是1.3亩）。1990年的人均家庭收入为1000~2000块钱。总体上看，毛市镇乃至监利县都没有（到现在也基本没有）工业、矿业，没有旅游资源，没有特产，没有区位优势。因此，传统农业之外，就只能向外输出劳动力了。

在1990年之前，我觉得毛市是一个“没有馒头”的乡镇。第一，因为是水稻的重要产区，麦子只是零星种植。我记得可能有的人隔年种过一两分旱地。第二，没有面食的传统。只有很少的家庭偶尔吃面食，面条是请客的时候才有的东西。第三，更没有人在外地以面食技艺谋生。所以从整个社会意义上来说，这个时候的毛市镇是一个与馒头无关的乡镇。

到了1991年，崔吴村开始有一批人出去，在武汉做馒头，这个乡镇就开始形成了以馒头为生的社会形势。2005年左右是最高峰，几乎所有能

出去的人都出去了，占据了各城市的各个菜市场卖馒头、包子，有传统面食区的，如西安、河南，还有非传统面食区的城市都开始出现我们毛市镇人开的馒头店、包子铺。

我身边最早的案例是我一个侄子，1976年出生的夏良武。1992年，17岁的他就开始跟着他舅舅出来做包子。舅舅在武汉球场街做生意，希望他过去帮忙，他也跟着学了两个月。那个时候还是需要一定的发酵技术的。有的人做的馒头就有黄有白，技术不行，生意就不会好。技术学好了，他从1993年春节开始和哥哥嫂嫂合作，到自己结婚后和老婆一起开店，直到2009年转行做别的生意，期间基本上一直做馒头生意。20年之间，毛市镇党委书记说馒头在我们镇至少培育了500个百万富翁。这在一个只有6万多人的小乡镇还是非常可观的。

馒头店本身也发生着变迁，由纯粹的人工操作发展到机器的全方位辅助。也就是说，围绕着馒头生产的各道工序，庞大的机器工业也发展了。从手工揉面到机器揉面、压面，发酵的面盆变成了和面机，煤炉变成了蒸汽炉。原来的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手工揉面，很花时间和精力，现在劳动时间依然很长，但劳动强度小了很多。品种也从单纯的馒头、包子、花卷衍生出各种小吃：花生白糖包、黄金玉米馍、富贵开花包、香辣雪菜包，还有各种烧饼、豆浆、卤鸡蛋等。但是生意也越来越清淡，有的甚至由坐店卖转为骑着摩托车、单车串乡串街去卖。曾经有的家庭年赚20万块钱，比较可观，现在一个家庭对年收入的预期底线基本上是8万块钱。就是说过年要拿8万块钱回家，才能应付各种开支。有10万块钱的年收入也算不错了，不过20万以上年收入的还是非常多。现在出去做馒头的人越来越多，年龄跨度越来越大。原来一般初中毕业才出去，现在是小学毕业，成绩不好就被爸妈拉着去做馒头

了。年纪大的也迫于形势出去。包括我的一个堂哥,他是1954年出生的,大概2007年才出去做馒头。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劳动强度太大导致腿脚发生伤病,今年就不得不回来做别的生意。

年轻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是不一样的。最早出去的一批人很能吃苦,一家人在案板上或者打地铺睡觉。中大(中山大学)女店主说她姨父做馒头时为省钱睡地上,结果得了风湿病,现在完全瘫痪在床。现在的年轻人则讲究吃好喝好玩好,对金钱的概念与老一辈完全不同。我的一个侄女在桂林做馒头,她说桂林最好的宾馆都去住过了,还在那里边打过牌吃过饭。

下面是我最近在中大附近的一个店了解的情况。他们来自毛市镇附近的一个乡镇。女店主1979年出生,有公公婆婆在这里,还请了堂弟和外甥。房租每个月4000元。基础设备是两万块钱可以开张,雇工是每人每年2万块钱包吃住。作息时间基本上是凌晨1点钟起床,晚上7点钟收摊,中间基本上不休息或轮流休息。老板抱怨说两位亲戚不上心,老板还在守着摊子雇工就回去睡觉了。工作量,她说是每天做两袋半面粉。两袋半面粉做包子、烤饼的营业额是1200元左右。一年下来,她要给两位雇工4万元,房租水电开支是5万多元,如果他们自己4个人赚不到16万元,就太不合算了。也就是说,这个门面的净收入一年应该是25万元以上。他们曾经在南昌待过3年;昆明待过3年,生意好而治安不太好;在顺德待了两年多,生意不好;今年到广州。从店外的广告牌上,大家可以看到品种很多,从饼到馒头,应有尽有。

早上7点45分左右,我观察到基本上没断过客流。最多十来个,每个人交易额基本是2至3元。门面很普通,三进的房子,另外还租了住房,两夫妇住店内,其他人住出租屋。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这是蒸馒头的蒸笼,这是压面机(如果

非常疲劳的话,这个压面机会“吃”掉手指或使人骨折),这是购回来的面粉,这是正在发酵的面粉,这是他们做出来的饼和馒头。每个包子都要标明是菜包、肉包还是香菇包。他们做生意很细致,也很辛苦。

每一个馒头店里面都有着社会关系的存在。中大店的这对夫妇是姨夫带出来做包子的。学会了,结婚之后就跟着丈夫一直在外面做。两个孩子现在是由她自己的父亲带着,因为父亲曾经当过小学校长,教育方面还比较方便一点。做生意则是和公公婆婆在一起,又雇佣了17岁的亲堂弟和亲外甥。女店主说,他们经常卖包子的时候会听音乐,有时候会找错钱,但因为是亲戚,不好批评,否则孩子们一直都记得。这个关系是宗亲与姻亲混合在一起的。

接下来是我的一个侄子通过婚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夏良文的弟弟夏良武跟着舅舅学会了做馒头。夏良文结婚了之后跟弟弟在一起开店,也学会了做馒头。弟弟结婚之后,又带着妻弟妻妹一起开店。夏良武在成都生意好的时候想带着哥哥,但是由于妯娌关系不好而分开了。现在,夏良文是和他的一个妻妹夫妇在深圳石岩镇合伙做生意,雇了小舅子夫妇。这个妻妹是经介绍嫁到夏良文同村的,小舅子娶的也是同村人。其妹夫的哥哥在深圳龙华镇做馒头,他们经常在一起过节、打牌。夏良文的另外一个妻妹嫁给了弟弟夏良武的妻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关系全部是通过馒头建立起来的。

另外一种社会关系是地缘关系。出了门的都是老乡,老乡基本上都会互相照应。我姐夫的堂姐夫在串乡时候被当地人的车撞伤了,就和在当地做包子的老乡一起去找交警扯皮,结果判了三轮车司机赔偿。我们这个地方老乡在外见面非常亲切,都会说老乡好,绝少同地开档,除非是经过认可的,就是说这个地方生意实在太好了,

我必须请一个人来,否则外地人来了还是会开档。这些关系还体现在信息咨询方面,如哪里有便宜的面粉,做什么品种畅销,器具如何维修,哪里的生意更好。年前至普遍出门的大年初七初八,大家都在交流这些信息,有的甚至在临出门的时候马上转到另外的地方找铺头。我一个堂兄在西安做了几年,生意不好不坏,今年临上车去西安的时候,一个同村的人打他电话,说浙江某地生意好可以转给他,他去了之后发现不太好,现在又转到珠海做。他们基本上就是通过亲戚朋友之间的交流,来判断哪边生意好。

从姻亲、宗亲,到朋友、同村同乡,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成为毛市镇农民经济生活中的“酵母”,推动着馒头经济的发展。同时馒头也在推动着社会生活的改变。

一是个人生活节奏变了。他们由早睡早起变成了早睡夜起,生活节奏很紧凑,凌晨1点钟起床发面,晚上七八点钟才收档。主要的生活地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生产方式变成了一种自我雇佣的劳动方式。他们在外面开始有一种对农民阶级的认同意识。跑过很多城市之后,他们会说我们农民还是很苦之类的话。他们对现在的职业有一些负性的认同,说农业没出息了,做包子才能赚钱,对教育则更不重视。有的孩子初中高中考得不好,家里人就说别读了,回去做包子,反正读大学毕业了才2000块钱一个月,还不如做包子。

二是农村社会生活节奏也发生了变化。外出的人要做生意,只有农历11月份到正月十五之前,村里人才比较齐,因此所有的喜事,包括5月份生的孩子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宴请。这段时间里,除了除夕和正月初一、初二不办喜事外,其他时间村里人都用来办喜事。原有的一些禁忌被打破了,也只有这个时候办事才热闹。年轻人相亲、结婚都很快,16岁左右的年轻人跟着父母出去做一两年包子,听说别人家里做包子发财了,有

孩子比较般配,相下亲,看对眼了就马上安排结婚,一个月搞定。然后孩子们开始自己出去开店。

三是可观的外来现金收入使毛市镇乃至整个监利县产生消费性经济、炫耀性经济。县城的消费堪比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我举个例子,县城的一碗热干面是3块钱,武汉的一碗热干面是两块五。同一品牌的衣服,监利县的专卖店比武汉的要贵。此外,出现了很多不良的消费习惯,比如喝早酒,一清早起来就喝酒。炫耀性经济的例子是打大牌。现在他们回去不是喝酒,就是打牌。30岁左右的人回去打一场麻将,5000块钱的输赢是最常见不过的了。我经常问他们,以前是1块钱4个馒头(现在是1块钱2个),一场牌输了成千上万个馒头不心痛么?他们说没办法,年轻人的消费就是这样的了。另外一个就是房产。农村的是自己做房子,主要还是在农田做房子。宅基地占了良田,导致农田的隐形抛荒,两季只种一季了,不好的田就不种了,公共基础设施很多都被废弃,如小水利等等,所以干旱时常发生。“386199部队”就不说了,这个比例越来越大。我的一个伯伯80岁了,常年一个人在家。去年,老人家眼睛实在看不到了,今年我堂哥才回来照顾。可见农村老人的生活是越来越苦。

四是从活路到支柱产业,馒头改变了我们的乡镇。2009年有一个报道(荆州新闻),说毛市镇在各地从事馒头等面点加工行业的有2.5万人,年创收入近4亿元,是该镇农业经济总收入的4倍。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授予毛市镇“监利面点师”劳务输出品牌,中国粮油学会发酵面食分会也授予毛市镇“中国面点师之乡”称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还特地在毛市举办过面点师的培训会。同时,馒头产业辐射到监利县的各乡镇,大概是从业10万人,劳务收入13亿元。

不过,这些从业者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我开玩笑说我们监利县的三大产业,一个是毛市的

馒头,一个是朱河镇擦皮鞋的,还有一个是网市镇在外划玻璃的。他们至今都没有受到重视,包括在学术界也没有。他们既不是集体经济,也不是正式就业,又不包含在统计数据里面。他们现金收入的风光背后有着说不出的艰难与辛酸。我侄子说:“有时一天我只睡3个小时,钱是好赚,但身体顶不住啊”,“2008年春节雪灾,老爸和儿子没法到成都和我们一起过春节,我们两口子忙活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儿子打来电话,想想万家灯火,祭神放鞭,吃团年饭,我无法(自己)。接完电话,和老婆一起哭得一塌糊涂。那个滋味只有经历过的才有体会。”今年,一个侄女婿的手被压面机弄骨折了,还有一对侄子夫妇都因为太疲劳而受伤。

这是一首从网上下载的诗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为了生存奔走四方,两湖两广东北浙江,毛市包子名震八方。馒头包子花卷发糕,闻鸡起舞和面磨浆,为了明天生活小康,一年到头不知疲倦。舍老弃小天各一方,恋家之亲何等忧伤?辛辛苦苦把钱来赚,才有明天希望曙光。希望你们衣锦还乡,勤俭节约共赴小康。”这基本上是他们在外生活的写照,还是有很多人怀念故乡,或者想要回到故乡。

因为没有做很正式的调查,讲完这个故事,我只有一个小结。在制度之外,人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市场中寻找着生存之道,因为这个不是市场之外的,它本身是在市场经济之内的。在社会这个层面,经济里面最强大的动力是各种社会关系,而不是各种各样的制度、框架的设计。馒头经济网络是一种原始的“斯密型”动力,允许依托劳动分工和绝对优势实现出现商业扩大,允许人们专心于那些更能发挥其生产能力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关系成为了社会经济的一个主要“酵母”。从馒头成为产业经济,并且带来社会生活的改变来说,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人民自己

推动的。但是这种社会经济也带来了一些非预期的后果,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

黄万盛(前哈佛大学研究员):

我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陷入一个困惑当中,特别是对未来经济体系的困惑当中:是继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按照理性选择的价值来发展出一个非单一的经济体系?是继续寻找新的资本主义,还是寻找一个不被资本主义捆绑的新世界?我非常赞成崔之元昨天说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当下。如何面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存在,事实上是20世纪以来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最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发明,假如没有市场经济,我们不可能坐在中国而使用在美国发明的iPod、iPhone等等东西。

但是另外一面,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在进行商品的流通,它把货币变成了商品,它在货币商品的意义上发明出各种各样的衍生品,它利用市场的机制为人类制造巨大的贫富差别,它甚至利用市场的力量摧枯拉朽地消灭地方性的差别。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任何可以从根本上消灭市场经济而走出另外一个经济结构的前景。市场经济是重要的价值,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弊病。真正的困难也即是在这个情境下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来选择。

我想有一个方面可以来支撑我们。实际上东亚“四小龙”出现的时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国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东亚“四小龙”的出现有没有非美国、非西方的因素。当时有一些傲慢的学者,比如塞缪尔·艾森斯泰德就提出“west and rest”,要发展只有一个模式,就是我们西方的模式,其他的都是另类。这是多么狭隘的看法!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中国出

现了,而且中国出现的意义远远大于当时的亚洲“四小龙”。至少在最近的三年内,我在美国各种报刊上读到的认认真真探讨中国繁荣和强大后面的制度化原因的文章不下五六十篇。所以我们在这个变化中看到一个可能性,就是全球化在造成一个普世化的过程当中,同时展现了各种地方资源可以利用这个普世化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并且去改变这个普世化原来的规定性的各种局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去了解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对于整个经济组织方式的渗透以及所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形态,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可能成为对人类的深刻贡献。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一类问题,事实上是严肃地对市场经济的各种恶果做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参与到这个进程当中去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能想象中华民族会远离市场经济而把自己的门户关闭起来,但是,我们必须严肃而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参与不是随波逐流,不是大江东去中的一滩泥沙被彻底荡涤掉,而是作为一个有主体意识的异体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有我们自己的贡献,而且因为我们的贡献可以改变它的存在。所以各种地区经济的意义,经济的多样性,实际上也是为了突破市场经济的单一性。因此我想回到 Adam Smith 在《国富论》当中最后的立场上来。亚当·斯密非常重视市场,但是他更重视在市场经济下的贫困、文盲以及贫富差距问题,他本人就希望见到多样化的制度,即多样化的经济原动力。他不单认为国家有责任去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情,而且也认为市场并不是全能的,应该灵活地以各种不同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在市场和国家、社群的合作中可以产生更美好、更多样的经济体系!

谢谢大家!

注释:

① Esteva Gustavo,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 New Jersey: Zed Books.

② 同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务卿杜勒斯和其兄弟中情局头子艾伦·杜勒斯在1953年推翻伊朗摩萨德政权,摩萨德当时正在执行国有化政策;1954年赞助危地马拉政变,支持有利于美国联合水果公司的政权。

③ 彼得·伯格:《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蔡启明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版;罗斯伯格:《发展理论》,马绍章译,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版;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台北:九大桂冠联合出版社1989年版;萨米尔·阿敏:《不平等的发展:论边陲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构》,台北:九大、桂冠,1989年。陈映真对殷惠敏的笔战1988年才收录于《西川满与台湾文学》一书中(陈映真:《西川满与台湾文学》,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罗斯伯格(Ian Roxborough)的《发展理论》破解了西方社会科学如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现代”二元分法。他认为如此划分陷入了3个误区:一是所有低度发展社会,都可以合理地看成封建的社会;二是所有社会不可避免地都要循单一、固定化的演化路线前进;三是社会变迁是由内部发动的。罗斯伯格列举拉美“发展型国家”的特点是威权主义、劳工边缘化和依赖外资等,造成第三世界内部与外部的不平等关系。他认为第三世界发展型国家存在异质性,有语言、种族、地域等差异。虽然是威权政体,但却难以贯彻其政策,因为依赖型经济体系会出现“内部无衔接”(internal disarticulation)与“对外有衔接”(external articulation)的社会内部矛盾与世界生产方式。

④ 施信民(主编):《台湾环保运动史料汇编》,南投:国史馆,2006年。

(录音整理:汪广龙、赖诗攀)

责任编辑:吴莆田 郑英